

编者按: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乡的中共北京市卫生局党校院内,有一座依山而建的三角形浮雕墙。这就是2006年6月24日落成的,以纪念在SARS战役中牺牲烈士的“救死扶伤纪念馆”。

生命已逝不可追,留给后人的,是永久的思念。



从北京市区乘坐地铁再换公交,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后,记者走进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乡的中共北京市卫生局党校院内。

这就是于2006年6月24日落成的,以纪念在SARS战役中牺牲烈士的“救死扶伤纪念馆”。浮雕墙的前面是一名身着防护服的女护士雕塑,手持鲜花,打着胜利的手势,面带自信而欣慰的笑容。

他们分别是: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主治医师李晓红、怀柔区第一医院病案管理员李进惠、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治医师段力军、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护士长王建华、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技士杨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丁秀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士长王晶、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主治医师李彩尧、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主任医师张林国。

生命已逝不可追,留给后人的,是永久的思念。

局外人

“每年我们丁秀兰的战友都会自发组织来到这里给前辈们扫墓,他们的音容笑貌,依旧是那

思念,让我们隔山相望

■本报记者 张思玮

么亲切,仿佛并没有走远。”SARS来袭时,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科主治医师李博正在中日友好医院实习,虽没能真正参与到一线的救治过程中,但那场“战役”却让他久久不能忘怀。

起初,李博并没有意识到这场“病毒”如此嚣张。“只听说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在北京蔓延,学校和医院的老师也多次强调加强自身防控措施,但对于我们这一群实习生来说,终于有了一个缺勤的最佳理由。”

但随着医院门诊量的与日剧减,以及家人和周围朋友的劝阻,李博的内心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

最终,在疫情的紧迫态势下,中日友好医院考虑到学生的安全问题,决定停止一切实习活动。

“那时候,走在人流稀少的大街上,每个人的表情都有点惊恐。”作为中日友好医院实习组组长的李博,每天在发药,统计名单、发放口罩等物品这种平静、有规律的生活中心度过。

李博说,当时他并没有“乱了阵脚”,每天与女友一起积极准备研究生的复试。但每当听到媒体中播报疫情情况,以及医务人员不幸感染去世的消息时,他内心总会“咯噔”一下。

“他们恪守医务人员的职责,不顾个人安危,奋斗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篇篇华丽的乐章,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李博眼角流下的泪水滴落在衣服上,他并没有擦拭。

亲历者

没有真正参与到SARS这场战役中的李博,也许只能是一名“局外人”。而对于从疫情的开始坚守到这场战役结束的陈红兵来说,可以称得上是这场战役真正的亲历者。

“刚开始,还不叫‘非典’,大家只觉得这个病潜伏期短,来势凶猛,并且病情进展极快。”解放军第309医院全军结核病研究所结核四科主任陈红兵说,以前国内也曾发生过一些疫情,但是多集中在某个区域内,控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而SARS的疫情能够在国内大面积、迅速地暴发,既与病毒本身有关,也与人们现代化生活方式存在密切联系。

陈红兵所在科室本身就是全军结核病研究所,专门从事呼吸系统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自然,当SARS来袭的时候,他所在的科室“有足够的理由”被改造成为隔离病房。

“只要有病人从院外转过来,我们都是亲自下去把病人直接接上来,不让其他的医务人员接触,避免感染发生。”陈红兵说。

自2003年3月16日开始,陈红兵便不再回家,为了不让人家过分担心,他在回家收拾行李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上面有任务,要隔离,接收病人。”当时,真的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情绪。

自此,在接下来的100天内,他整日整日吃住在病房里。“我当时对SARS没有太多的恐惧,一方

面因为本身就是从事呼吸系统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工作,有一定经验;另一方面当时也没有听说医务人员感染死亡的案例。”

但在实际接诊过程中,SARS患者的病情进展速度着实让他有些意外。

“前一个小时查房还好好好的,没想到,你刚转身走,他就出现呼吸衰竭了。”陈红兵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家三口都因SARS收治到隔离区,但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相继去世。

直到如今,陈红兵依然难掩心中的遗憾之情。“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医护人员真的都已经尽力了,但当时真的是束手无策啊!”

整个SARS战役过程中,最让陈红兵担心的事情不是他个人的安危,而是要谨防团队中的医护人员出现感染情况。“一旦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出现感染情况,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战斗力。”

再强大的内心,也需要家的温暖,在隔离的日子里,陈红兵每天都会给家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因为隔离区正好在山的下部,我家人好几次爬到对面的山上,拿着望远镜朝我们这里看。”

正是由于陈红兵在科室内部及时规范了医护人员的防控措施,在整个SARS救治过程中,该隔离病区共收治患者202人,治愈177人,转院7人,死亡18人。没有一个医护人员被感染。

谈到在这场SARS战役中的最大收获,陈红兵不假思索地说出这样一句话:真正感受到了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精神。

又见四月玉兰开——追忆北京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

■本报见习记者 牟一

10年,又是四月,北京的玉兰花已经开放,淡淡的花香和着春风拂过人们面颊,洁白清雅的花瓣昭示着生命的勃发,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愿望。

人人都爱玉兰的美,但又有谁会像她一样年年被想起,“每每望之,心中就泛起无限的悲伤和感叹,并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蚀心的滋味,凝视兰花之后已是泪水盈眶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王少杰回忆道,“年年如此,因为每年四月兰花开了,我就会想起秀兰”。

丁秀兰,一个亲切柔和的名字,但是10年前的SARS却无情地夺去了她的生命,时任北京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急诊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的她,去世时才49岁。

“和秀兰相识是在十几年前的一次急诊科会诊上,”王少杰叙述道,“患者是一个老年人,会诊时我翻看着病历,秀兰一直在一旁介绍着病人的情况,竟然详细地把患者微小的体征变化和十几

项化验数据说得一字不差,让我差点误认为她是病人的亲属了。”

“她在会诊结束后,拉着我的手,很感谢我从老医院快速过来会诊,”王少杰接着讲,“她对我说,‘我刚调到院来,姓丁叫秀兰,玉兰花的兰,名是俗了点,可是好记’。说完就笑起来,爽朗极了,让人感到既直率又朴实。”

“医学是一门复杂科学,有许多未知数,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疑难病症,她在急诊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向她请教时,她总是认真地帮我解决。”王少杰说道,“一个人的理想信念以及执著的追求能化为工作的动力,在平时可以做到的人已属不易,如果面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仍然毫不动摇地身先士卒,就尤其彰显人格魅力了。”

十年前的春天,SARS的阴霾促不及防地袭击了中国大地,急诊室的工作更加繁忙。每

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着SARS造成的残酷现实,然而,秀兰却一天也没离开过急诊的第一线。她看到太多被SARS打倒的患者,她太深刻地明白一旦倒下意味着什么。她的身影更频繁地往来于患者之间,丝毫不省略检查的步骤,“啊——张开嘴,让我看看你的嗓子,解开你的衣服,让我听听你的肺部……”所有发热的病人都到我这儿来!”看到这些,王少杰的心在颤抖,为了减少他人感染的机会,秀兰在用身体抵挡SARS的危险呀!

秀兰在抗SARS战斗岗位上的唯一照片也是她生前最后一张照片,“谁也没想到我们给急诊科送中药的这张照片竟成了令人心碎的绝照。”王少杰叹息着说,“一天,我在老院接到秀兰的电话,她发起脾气来,‘少杰,发给我们急诊的中药为什么不够数?’我当时心里很冤,因为中医科只有一台煎药机,连续几

天12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煎12小时,机器都烧成红了,煎不出那么多的药,再说该发的都如数发了。”

直到医院被解除隔离的那一天,王少杰才得知了秀兰发脾气的真相:当时中药是如数发了,但是在每天早上发药,并且只发给在职工作的护士和医生,白天还有学生和进修医生,这样上夜班的同志就没有药了。秀兰担心有人服不上药所以就着急了。

“她没吃中药,她把药给了我们上班的。我们没得SARS,她得了,她走了啊!”急诊科的同志伏着肩头撕心裂肺地痛哭。

“秀兰不幸牺牲的消息传来,还是在隔离时期,对烈士的怀念没有条件做更多的事,”王少杰回忆道,“当时,门诊五楼报告厅成了临时纪念馆,悲痛的笑声淹没了院长的悼词声。后来大家索性抱在一起,让情感像开闸一样放开了宣泄,



丁秀兰

悲伤的气氛几乎让人窒息。”

玉兰曾把生命中最美的时光留给了春天,她绽开的时候是那么无私,奉献得是那么的彻底,凋谢的时无怨无悔,凄美、悲壮。空气中沉淀着淡淡的、甜甜的芬芳,弥漫地飘开去。

丁秀兰虽然离开我们十年了,可她的英名和事迹却广为流传。在网上纪念馆,一位网友用这样的诗句赞美丁秀兰:

群芳谱中一秀兰,忠骨柔情藏青山。化作春泥无憾意,清香长留天地间。

“我是医生,我不怕”——追忆全军第一位在防治SARS斗争中牺牲的医护工作者李晓红

■本报记者 张思玮

如果没有10年前的那次SARS战役,她现在或许已为人母,过着一名普通医生忙碌而又快乐的日子。

可人世间根本不会有那么多的如果,即便你不能接受,也必须面对——她不幸离去的事实。她叫李晓红,是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的一名主治医师,也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医护工作者在防治SARS斗争中牺牲的第一位革命烈士。她用自己年轻如花生命,书写了一名军医在疫情面前的那种临危不惧、敢为人先的高尚品质。

视线拉回至十年前,2003年3月25日。这一天,李晓红本可以在家休息。“医院前一天就批准了她休假的申请,我还特意嘱咐她,等身体养好了,再过来上班。”时任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任、现已退休的郭炳衡回忆当时的情况,言语中夹杂着些许伤感。

可李晓红却没有“遵守规定”,面对着突如其来

的疫情,她选择了与同事们并肩作战。

也就是在这一天,内科独立病房收治了第一例因高烧就医的外地患者王某。

“当时,几位内科值班的大夫都过来了解这位患者的病情,李晓红不仅跟踪查房,还详细询问了患者的病史。”郭炳衡说,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李晓红参与了该患者的胸部X光片复查和胸部CT检查。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她建议科室医务人员立即采取戴口罩等防护措施,但似乎这些日常的防护措施,并没有阻止SARS病毒的肆虐。

3月29日,内二科室先后有医护人员出现发烧症状。在家休息的李晓红心里惦记着同事和患者,再次来到医院。

有同事劝她留在家休息,而李晓红却说:“我对非典有一定的认识,我留下来最合适,我怎么能做逃兵呢?!”

但谁也没有想到,此时的病魔正悄然向她袭

来。

3月30日,李晓红开始发烧,她开始尝试用酒精退烧,效果并不明显,但她并没有和爱人刘会昭说,而是强打精神,继续上班。

而这一次走出家门,她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李晓红到单位后,体温迅速升至39度,科室相继有十几名医护人员出现高烧症状。

31日下午,李晓红第一次以患者的身份住进了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4月1日,经过多方协调,上级争取到4个转往解放军第309医院的指标。这是全军最权威的治疗传染疾病的医院之一,转到那里治疗,就意味着生的希望。

“当时院里首先考虑到李晓红,她非要把名额让给年纪大、病情重的同志。”郭炳衡说,在病房里艰难度过了3天后,李晓红的情况并未有所改观。4月4日,机会再次来临,在第二批转院治

名单中,李晓红又一次名列其中。而她却再次拱手相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

4月5日,李晓红跟随“大部”转移至京郊某隔离点。第二天中午,她便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必须转院!”医院专家组与院领导共同决定,不再与李晓红商量,强行安排转院。

4月6日,李晓红转入解放军第302医院。而进入医院后的第一件事情,李晓红先把这里的用药剂量和治疗方案,以及她用药后的反应,通过短信方式传回隔离点,为那里的治疗工作提供帮助。

“现在治疗上是否找到新的办法。如需要试验,就拿我做试验吧!我是医生,我不怕。”每次医生过来查房,李晓红都尽可能详细地把用药后的反应讲给查房的医生,并与医生一起分析治疗方案。

但病魔似乎更加猖狂。

4月10日,李晓红呼吸出现极度困难,开始用上呼吸机。但即便无法用语言交流,她依然坚持跟



李晓红

难地在纸上写下对自己病情的体验和分析,哪怕仅仅几个字。

“非典给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管理、防护、治疗等方面都应该好好总结……”在4月15日夕阳西下的时候,李晓红吃力地写下自己对非典的感受。

带着遗憾与不舍,更带着一名医护人员对职业的责任与使命,李晓红在4月16日凌晨3点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安静的面庞没有一滴泪水,仿佛仍然含着微笑。

尽职而已 虽憾尤荣——追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医生张林国

■本报见习记者 王俊宁

2007年的北京,春天依旧短暂而温暖。那年4月4日,清明节前夕,首都卫生界首次公祭在抗击SARS中殉职的英烈。“褪去一身红装,披上一层绿装”的北京西山上一座朴实的丰碑。这是SARS三周年的时候,落成的纪念首都医护人员抗击非典的“救死扶伤纪念馆”。丰碑依山而建,踏上一层层阶梯,用花岗石垒成的半圆形三角浮雕墙上,镶嵌着9位烈士的浮雕像和他们曾经的誓言。

北京抗击SARS牺牲的最后一名医务人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张林国的面孔也定格在了上面。

张林国于1963年2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唐县,1986年7月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系;1986年7月至1988年8月在山东省泰安市中医院工作;1988年9月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攻读研究生;1991年7月毕业,获医学硕士学位;1993年8月至1996年7月间师从著名中医药专家董建

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在解放军309医院消化科工作,于1998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3月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先后在外宾病房和消化科从事临床医疗和科研工作。

“英雄都不是天生的,也没有多伟大,只是在任何情况下履行了自己应尽的责任,问心无愧而已。”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消化科主任李振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都已经过去十年了,张林国用他在消化科不长的工作时间留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李振华介绍说,其实张林国在西苑医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不到3年。因此自己和张林国一起工作也没多长时间。但在他看来,张林国热爱中医事业,并为此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也获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理论研究方面,张林国具有深厚的中医基

础理论和中西医结合功底。他参与的“八五”攻关项目“消痞灵治疗胃癌前病变的临床与研究”获得了北京中医药大学1998年度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临床工作中,他以为病人治好病为最高宗旨,对待病人耐心细致,和蔼可亲,疗效卓著,广泛受到患者的好评和爱戴。他数十年如一日,凭着对中医事业的满腔热忱,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读书不已,笔耕不辍,共发表了学术论文近20篇,医学专著近10部,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振华告诉记者,早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当时还在解放军309医院的张林国参加了抗洪医疗队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因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并获嘉奖。因此,在SARS肆虐之际,医院决定成立医疗队时,他就积极带头报了名。当时消化科两位大夫被抽调去抗非典一线后,本来就人员不足的医生队伍更显得捉襟见肘,这时候张林国就主动承担起了超负荷的医疗任务。

作为主治医师,张林国亲自管理床位十余张,还要每周出门诊两次,尽管有数名重病人,但他从不畏惧和退缩,对病人总是那样耐心细致、和蔼可亲,无论多忙多累,他都坚持每日两次常规查房,重病人有事随叫随到,无数个节假日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工作中他不断告诫其他大夫护士们,做好自身防护,下班后他叮嘱大家必须吃饱吃好,保证身体的抵抗力,关心了解每一位同事的身体状况。

“后来张林国不幸染病,之后被隔离,最后以身殉职。”李振华说,“虽然在一起工作时间不算长,因为平时工作都比较忙,大家彼此私交也有限,但是张林国在西苑医院不长的时间留给了我们永久的财富。”

上呼吸机、全力抢救、火线入党、街头欢呼……这些场景后来被艺术家们浓缩进抗击SARS的“救死扶伤纪念馆”浮雕墙上。浮雕墙上



张林国

SARS疫情曲线图隐约可见,它记录了非常时期的一段生命数据,见证了大灾大难中的不朽精神,也深深凝固了那段历史的场景。

钟南山院士曾慨言:“抗非”斗争中,医护人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最怀念的就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救死扶伤的无畏精神,是医务人员最好的榜样!”如今当SARS离我们远去,在阳光春风中徜徉的人们也应该在这个春天温暖一下逝去的人物,缅怀一下那些不朽的英烈。